

内容简介

中国的第一代社会学者,曾经苦苦探索,以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的文化体系与社会问题,试图在动荡的大时代中寻找一条强国富民之路。本书生动翔实地勾勒了中国社会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建立、发展、变迁的过程,记述了陶孟和、李景汉、陈达、吴景超、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学术观点、社会实践和人生探索,探讨了中国社会兴衰与社会学以及社会学者命运的联系。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见解独特,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一部力作。

本书可供社会学界教师、学生和研究者阅读,也可供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研究者参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阎明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302-22866-0

I. 中… II. 阎… III. 社会学史—中国 IV. C9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079295号

责任编辑:周 菁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240 印 张:25.5 字 数:464千字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42.00元

产品编号:035802-01



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



1979年3月,在社会学座谈会上,费孝通教授(前排右1)同李景汉教授(前排左2)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合影。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西欧。从历史背景看,社会学是适应西欧急速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而产生的。在西欧工业化、都市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需要解释,并加以解决。从学术背景看,此时自然科学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日益精进,采用的研究方法或手段不断得到改善,学科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因此,人们对于深入地认识社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838年,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在他所著《实证哲学》第4卷中,首次使用“社会学”一词。这在习惯上被看做是此门新学科生命的开始。此前,他曾称这门新学科为“社会物理学”,期望像牛顿发现物理学定律一样,发现一套能解释社会现象变化规律的“孔德定律”。后来,孔德以拉丁文 socius(联盟,伙伴)和希腊文 logos(学问、真理)合成 sociologie^①这一新词。在创立社会学的过程中,孔德认为,人类对于各种自然现象——机械的、无机的、有机的,都已有专门的学科分别进行研究,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这些学科,依据其研究对象的逐渐复杂而依次精深。同自然现象相比,人类社会组织最复杂,研究社会现象的学科也应最精深。因此,社会学作为最晚出现的一门学科,应当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之上,并且要充分利用其研究成果的“科学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

自社会学诞生之后,其目标就是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群体行为和组织结构,解释人群间的对立与冲突,探求社会运行的一般法则,最终建立一个和谐、公正而有秩序的社会。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的发展并不尽如其创建者所期望的那样。社会学者们围绕一些基本问题,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应当如何,一人一议,十人十议,难以获得共识。而且,尽管社会学以“科学”自诩,但其性质却决定了它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外在因素的关系,远比其他学科同这些因素的关系更加密切而复杂。再者,作为一门学科,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工作,即培养人才、出版书刊、组织专业学会、开展学术活动等,也才刚刚起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自西方传入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样一个自我期许极高,却又处于幼年的学科。而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应当如何处理同西方的关系,解救民族危机并寻求一条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的主线。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社会学被介绍到了中国。可以说,与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相比,社会学在中国所面对的将是更大的机会和挑战,也承担了更为艰巨的责任。

① sociologie 即法语“社会学”。

第一节 以群学治群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学”的一部分被介绍到中国来,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对于西方的认识,从科学技术到历史地理,进而到社会制度与思想的层面,逐步深入。最初在中国出现的社会学译著,包括英国社会进化论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美国社会学家福兰克林·季廷史(Franklin H. Giddings, 1855—1931)及数位日本学者的论著。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①另外,《昌言报》上曾连载曾广铨翻译、章太炎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②,梁启超和谭嗣同也分别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到过“群学”或“社会学”的概念。1902年至1903年,有几部社会学译著出版,即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③,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④,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⑤,吴建常自日文翻译的季廷史的《社会学提纲》^⑥及马君武所译斯宾塞的《社会学引论》。^⑦

这些最早翻译、介绍社会学的人,都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或留日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加过社会改良或革命运动。他们所翻译的西方或日本知名学者的著作,以论述当时流行于全球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主。最初,这门新学科所采用的译名,有群学、人群学、社会学、公益学等。但是,在多个译名中,最终流传下来的是日译“社会学”。实际上,日本在自西方引入社会学的初期,除“社会学”以外,也曾同时采用过其他译名,如“交际学”、“世态学”等。源自西方的社会学,却通过日本传入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先于中国自西

① 严复将斯宾塞译作锡彭塞,群学即社会学。《原强》,载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八至十三日(1895年3月4日至9日),辑入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章太炎:《斯宾塞尔文集》,曾广铨译,载《昌言报》,1898年8月17日—10月30日。

③ [日]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

④ [日]有贺长雄:《族制进化论》,上海,广智书局,1902。

⑤ [英]斯宾塞:《群学肄言》,严复译,即 *The Study of Sociology*,上海文明编译局,1903。

⑥ 即市川源三的译本,季廷史, *Theory of Socialization*,为其《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1903。

⑦ 即《社会学原理》的第2编《社会学引论》(*The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西江欧化社发行,1903。

方引入社会学,早在1880年,斯宾塞的著作即译成日文出版,东京大学于1893年开设社会学课程,为世界各大学之首;①而更重要的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这在老大帝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各方关注的焦点随之转向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取得了巨大成效,这其中必定有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特别是日本与中国,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民族习性和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很接近。通过日本了解西方,这应当是一条捷径。因此,日本便成为当时中国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扇窗口。

甲午战争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大增,1905年至1906年之间达到高潮,每年约有8000人到日本留学。②1905年,科举制度的完全废除,对新式学校教育以及留学教育又是一大促进。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与此前去欧美学习工程技术的留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人数众多,热心参与政治活动,主要以法政、教育或军事等为专业,自日文译介了大量关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书籍,其中包括多部社会学著作。再从翻译技巧上来看,日文译中文比直接翻译西语著作有着极大的便利。日本在幕府末期及明治维新时期,直接从欧洲输入西方文化。日本人借用汉字翻译西洋词语,又依汉语构词法径造新词。这种新词,中国人一听解说便可理解。因此,在现代汉语的词汇中,采用了大量的日语借用汉语词的转译名词,“社会学”便是其一。另外,在明治时代,日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在日文中几乎全用汉字书写,只是动词的语尾和几个助词用假名书写。梁启超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学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③可以说,这些翻译技术上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文译著的大量出版。章太炎便是在短暂的流亡日本期间,翻译了日本社会学者岸本能武太的著作。

日本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永久性的影响,是“社会学”一词。而真正抓住西方社会学思想的精髓,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严复是最早直接接触西方哲学与社会思想并将之系统介绍给中国的中国学者,以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真正了

解西方社会的“命脉之所在”。④严复于1877年公派去英国学习船政,但在其学习期间,他却对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兴趣,阅读了大量代表西方时代思潮的著作。回国之后,严复所学以谋“富国强兵”的技术,并未受到重视;他非科举出身,因此也没有社会地位。他发愤治八股文,准备科举考试,但却屡试失败。

甲午战后,严复因中国割地丧师而大受刺激,遂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西方思想,主张社会变革。《原强》正是代表他开始走上公众舞台,发挥影响力的论著之一。在《原强》中,严复首先简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然后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斯宾塞以其宏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运用“进化”这一生物学学术语,论证自然界、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演变,提出“适者生存”的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和斯宾塞的“适者生存”,成为广为人们所知的表述进化论思想最简捷有力的口号。同时,斯宾塞以进化论原理,解释社会历史的演进,创立了社会进化论。他也因此成为19世纪下半期最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当时中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思想方法,即将西方思想同中国古代圣哲的思想作比较,试图找到双方的相通之处。作为一位饱读经书的学者,严复也不例外。他在解释群学时,主要依据的是荀子的思想。群学的“群”字,即出自《荀子》。这一做法可谓非常恰当。荀子是中国先秦哲学家中最系统地阐述过社会组织的一位。荀子认为,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人能群”的特性是共同生活、分工协作并建立政治法律制度 and 意识形态的基础,也即社会生活的基础。

严复赞同孔德及斯宾塞所认为的群学是各学科之后的“最高学问”,也是最难治的学问。他认为,研究群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群之理”,以“图自强”。他说:

“有国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本以拯弊也,而所期者每不可成,而所不期者常以忽至。及历时而曲折多,其利害蕃变,遂有不可究诘者。是故不明群之理,不独率由旧章者非也,而改弦更张者,乃愆误,因循鹵莽二者必与居一焉。何则?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是故欲治群学,且必先有事于诸学焉。……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近于邕治馨香之极盛也。”⑤

从这里可以看出,严复非常重视群学的作用,他认为如果不研究“群事”,

① 参见《社会学史》,4,111页,台北,启明书局印行,1961;李剑华:《日本之社会学界》,载《社会学界》,卷一,221~245页,1927年6月。

②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③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2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3。

④ 严复:《论世变之亟》,载天津《直报》,1895年2月4—5日,辑入《严复集》,第1册,上,1页。

⑤ 严复:《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6~7页。

不明了“群理”，在治理国家上就会有大的盲目性。而要研究群学，则先要研究各门科学，并以此为基础研究群学，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严复进一步运用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斯宾塞认为，社会组织就好像一个生物体，各个部分之间并非机械的结合，而是有机的互动，因此，“富强不可为也，特可以致致者何？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在严复看来，中国富强的根本在于“群”，或者说，是不能“群”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力已困。在此情况下，仅靠一两位领袖的作用，是不能振兴国家的。严复又引述苏子之言：“天下之祸，莫大于上作而下不应。上作而下不应，则上亦将穷而自止。”中国的民众如此衰弱，而“善政如草木，置其地而能发生滋大者，必其天地人三者与之合也，否则立槁而已”。^①因此，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既要治标——收大权，练军实；也要治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1903年，当严复正式翻译出版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时，他更明确地提出社会改良的主张。《群学肄言》是一部关于如何研究社会学的书，算不上斯氏的代表作，但严复从斯氏大量的著作中选择了它，说明他很看重社会学的方法论。在严复看来，人们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理智、全面地看待事物。而斯氏这部书的关键，就是充分论述了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之难，从而纠正了他自己“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②应当说，正是严复所经历的挫折，使他对斯宾塞的观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曾写万言书欲上达皇帝，为新政出谋划策。可是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1900年的“庚子事变”，也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实行共和体制；中国文化亦不应完全否定。他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根据国情，批判地接受旧文化，逐步改进：

“乃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薄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③

在这里，严复批评那些浅薄急进的人，意识不到事物长期演变的前因后果。他们捋袖奔走，说是在旦夕之间便可振兴国家。未成，便又莽撞高喊，要带着大家盲目冒进，进行破坏。但破坏之后所新建的却又未必合适，为什么不能慎重

一些，先学习研究，这样会更好一些。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多次以按语的方式感叹改革之难，不能太急、太剧烈。例如“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①高凤谦为《群学肄言》作序，也呼应严复的观点：“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许多人以为不必进行研究，便可随自己的心意治理社会，结果人人说要治理社会，天天说要治理社会，然而社会还是改进不了。《群学肄言》一书，几十万言，千头万绪，其根本的目的是阐明治理社会之艰难。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记述个人的经历或社会的历史，人们往往注意他们所想看到的事物的某个方面，进而称之为事实。特别是像社会进化论这样的经典理论，也曾经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国家，从各自的背景和需要出发，做出相应的阐释。如前所述，社会进化论曾经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影响极大的学说。当时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想界，都根据社会进化论来强调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性，结果或倾向于个人主义（如美国），或力倡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如德国和日本）。在中国，严复所翻译的一部有关进化论的著作，即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鼓吹生存竞争的思想，为主张革命的人们提供了理论根据。因此，他在翻译《天演论》后继而翻译《群学肄言》，目的就是要使“蜂起者稍为持重”。^②然而，从《原强》到《群学肄言》，严复强调的是社会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千变万化的各种因素之间定有因果关联性，而这种因果联系是一种有机的联系，绝不能机械地割断。他说：

“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僇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刑礼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器，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③

严复认为，社会的差别取决于其人民的品德素质。使一个本来贫弱、不发达的国家，突然之间变成富强、文明的社会，必定办不到。若人民的品德素质不高，仅靠技术或策略达到目的，也不能维持长久。再者，制度礼俗的形成，都有各自演变的根源。因此，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可去除愤怒喧嚣的情绪，令人客观理智地思考，这是出自中庸之道。在这里，严复终于将西方的科学方法，

① 此段中的引言均出自《原强》，载《严复集》，第1册，上，13~14页。

② 严复：《译余赘语》，载《群学肄言》，改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载《群学肄言》。

① 参见《群学肄言》，49、50页。

②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载《学衡》，第16期，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3。

③ 《群学肄言》，312页。

同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融会在一起。他据此既反对激烈的变革,又批驳守旧者:“得吾说而存之,彼两家之难可以解。夫维新之急者,有所祈也,守旧之笃者,有所惧也。惟群学通,则祈与惧皆可以稍弛。”^①图谋社会改革的人期望高,往往操之过急;维护旧制度的人,害怕变革太大,又失之保守。只有真正理解了群学,才能融合新旧,解决两难之困境。而在现实中,中国真正的出路在于教育。1905年,严复在伦敦遇见孙中山,他对孙中山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混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②

综上所述,严复反复强调社会改革的艰难。他认为,不是不要变法,而是不能急功近利,妄想在一夕之间振兴国家。事物的发展总有因果联系,倘若不自教育入手,从根本上改善国民素质,仅以政治的手段,实施几条新法,绝不可维持长久。所谓破坏容易建设难。社会的改造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可操之过急。要先对中国社会做精密切实的研究,然后再来制定适当的救国方案。研究社会学,即可帮助人们了解社会治乱兴衰的原因,进而提出良政之策。但是严复的这一重要思想,在当时一片救亡图存的呐喊声中,没有引起太多的回响。在他的多部译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这本书自1898年在中国出版后,十多年中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使得稍有血性的人都知道,中国必须发愤图强,才可免于亡国的命运。然而,为了急于救亡图存而进行的种种尝试,也使中国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认识社会,解决社会问题,绝不能靠情感,非得用理性,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一步步去做不可。这一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学在中国复杂而曲折的经历。

第二节 学科体制建设的起点

在近代学术史上,一门学科的发展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或是说,靠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学者个人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二是在高等学校中设立相关科

① 《群学肄言》,312页。

② 王蓬常编著:《严几道年谱》,辑入《民国丛书》,第3编第77册,74~7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

系培养学生,成立专业学会,出版专业期刊等,即所谓学科体制的建设工作。在中国社会学的传入时期,严复等人译介社会学说,可代表第一个方面的工作。然而,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扎下根,并有了长足的发展,是由于它作为一门学科,在高等学校体制中,形成了完整的教学、研究体系。在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的,是数位美国传教士,因为他们在教会所办的大学中的热心推动,促进了这门学科建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开始以日本的教育体制为样板建立近代高等学校,如京师大学堂、京师政法学堂等。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按日本体制分8科,在经学科和史学科所列课程的“随意科目”(相当于选修课)里列有“公益学”,并解释为“日本名社会学,近人译作群学”。但“以上各随意科目,此时初办碍难全设,应俟第一期毕业后体察情形,酌量渐次添设”。^①1911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仍列有社会学课程,但直到1916年才首次开设这门课程,由章太炎的学生、自日本留学回来的康宝忠任教,这是中国人讲授社会学之始。^②

20世纪初期,国立高等学校不发达,也不重视社会学的发展。相比之下,西方教会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最早、最热心推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的,也是这些教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学初期的发展,也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早期美国社会学家,或出生于牧师家庭,或曾经当过牧师。哈佛大学的社会学课程,最初是在其神学院中开设的。^③同美国相比,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基督教有更加直接的联系。

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开展教会工作的历史很长。传教士们在办教会的同时,进行更广泛的慈善与文化活,如设立医院,翻译出版有关西方科技和文化的书籍,并逐步开办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会办学之初招生很困难,因为传说教士要把孩子们杀死,以便将其身上的器官制作药材,所以中国人不肯把孩子送去。当时许多教会学校要靠免除学杂费、提供膳食作为优惠条件,以吸引学生。^④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人逐渐了解教会学校的优良教育,特别是其外语和数理化等专业,开始成为中、上等家庭子弟的报考热点。20世纪初期,教会大学无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都比中国人所办的公私立大学发达。这些学校多数是由美国各新教教派组织资助设立的,学校中的教员几乎全部为美国传教

① 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101、104、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② 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217页,台北,里仁书局,1982。

③ Barry V. Johnston, Pitirim A. Soroki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awrence, Kan.: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p. 56.

④ Hugh P. F. Tam, “The Past of Boone University,” *Boone University*, 1871—1921, p. 3. UTS.

士。除开设中文课程以外,学制完全按照美国大学的体系,兼顾文理科,注重“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Liberal Arts)。^①

在教会大学中最早开设社会学课程的,是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这是一所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于1879年由美国主教派教会(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创立,初名圣约翰学院,1906年改称圣约翰大学。1904年,年轻的美国传教士阿瑟·孟(Arthur S. Mann),在取得耶鲁大学学士学位和神学学位之后,来到中国。刚到圣约翰大学时,他曾教授经济学、《新约》评注、布道术等课程。1905年,孟以当时在美国流行的白格达的《物理与政治》(Wal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1872)为课本,教授社会学。1907年,孟为救一位朋友,在广西溺水身亡。为了纪念他,圣约翰大学将一幢学生宿舍取名为“思孟堂”。孟的父亲为了纪念儿子,设立了奖学金,每年提供100美元,资助一名中国大学毕业生到美国留学。中国的第一位社会学博士朱友渔,便是这笔奖学金的第一位获益者。^②

最早比较系统地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是上海浸礼会学院及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这所学校后改名为上海学院,又改为沪江大学(为方便起见,以下将这所学校统称沪江大学)。沪江大学坐落在上海市郊的黄浦江边,由美国南方浸礼会的国外布道委员会与全美浸礼布道联盟的执行委员会共同资助。^③ 20世纪初期,在其神学院里开设了“伦理与社会学”课程。^④ 1914年,该校成立社会学系。然而,所谓的社会学系,其实只设有一门社会学课程,^⑤由美国布朗大学毕业生、年轻的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 Kulp II, 1888—1980)讲授。^⑥ 葛学溥曾在布朗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圣经》研究,于1913年硕士毕业以后来到中国,目的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建立“布朗”模式。^⑦ 这门课的内容是进化论,采用布朗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狄利(James Q. Dealey)所编教材,参照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 Ward)的《应用

社会学》,并且对上海市的教育机构进行社会调查。^① 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增加至5门,即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及社会调查。^② 在教授“社会调查”课程中,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地区的东部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③ 这是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当时,葛学溥并非专职的社会学教师,在主持社会学系的同时,他还兼管体育系和英文系,^④可见这些系的规模之小。实际上,直至1921年,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社会学系才建立起来。

葛学溥建立社会学系,并进行社会调查,是从基督教社会服务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中国(具体地说是上海)正在经历迅速的工业化,而物质进步非但没有带来精神文明,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基督教会绝不能对此漠视,迫切需要对工业区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⑤在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葛学溥将社会服务看做是基督教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传教与社会服务的侧重点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为了改善人际关系与社区福利。另外,社会服务是有助于传教的。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某个社区传教,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通过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较容易取得人们的信任,从而便于传教。^⑥

1917年,葛学溥在上海东部的新工业区——工厂林立、人烟稠密的杨树浦地区发起成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并称为“沪东公社”。对他来说,这是一箭三雕:一是为当地工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二是沪大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宗教等专业的学生可以此作为一个“实验室”,开展社会调查;三是传教。沪东公社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得颇具规模,成立了小学、工人夜校、阅报室、平民女校,并组织了名人演讲会、职业指导与介绍、文体娱乐、公共卫生等活动。直到20年后,也就是1937年,由于日军轰炸,工作才被迫中断。^⑦

葛学溥对于在沪江大学进行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可谓雄心勃勃。他计划建立一个“布朗社会学学院”,由他的母校——美国布朗大学出资15 000美元。这个学院在体制和人员安排上完全仿照布朗大学,并由布朗大学审核、管理。在这一时期,布朗大学的社会学在美国高等教育中是位居前列的,有“美国社

① 若要深入了解中国教会高等教育的历史,参见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②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51*, N. 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p. 50, 67, 71; *St. John's University, Catalogue, 1910*, p. 38, UTS; 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经过和范围》,载《社会学刊》,第2卷第2期,6页,1931年4月。

③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a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of America.

④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Catalogue of 1912*. UTS.

⑤ *Bulletin of the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 Vol. II, No. I, June, 1915, p. 5; *Catalogue*, 1914, p. 13. UTS.

⑥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Catalogue*, 1916, pp. 16~19. UTS.

⑦ Kulp, Daniel H., *Personal History*, 1933. BU; *Scholastic Experience*. ABHS; *Application for Appointment as a Missionary*, ca 1910s. ABHS.

① *Bulletin*, Vol. II, No. I, June 1915, p. 5. UTS.

② *Catalogue*, 1915, p. 25. UTS.

③ *Bulletin*, June 1916, p. 9. UTS.

④ *Bulletin*, June 1915, pp. 5~8; June 1916, pp. 9~11. UTS.

⑤ *Reported by Kulp in the Bulletin*, Vol. III, No. I, June 1916, p. 10. UTS.

⑥ Kulp, Daniel H., "Social Work and Christian Propagand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4, No. 3, March 1923,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pp. 145~152.

⑦ 见历年 *Bulletins*. UTS.

会学之父”称号的沃德,晚年便在布朗大学任教。^① 葛学溥也在布朗大学选修过沃德讲授的课程。^② 葛氏的计划包括建立社会学图书馆、社会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及社会学社。其中社会学社的工作包括向社会服务工作者提供帮助、翻译社会学文献、编辑出版刊物,并使之成为“东西方交流站”。^③ 不过,葛氏如此庞大的计划,其大部分都似空中楼阁,未能实现。然而,也有一些计划付诸实施的,如沪江大学接受布朗大学每年5000美元的资助。布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社会学家狄利,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在沪江大学做访问学者。^④ 另一位布朗大学的社会学教授白克令(Harold S. Bucklin),也于1923—1924年到中国,讲授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社会调查等课程。^⑤ 他还指导学生从事社会调查,其成果《沈家行社会调查》作为沪江大学的布朗丛书之一,于1924年出版。到1930年,社会学系在沪江大学是除商业系以外学生人数最多的系。^⑥

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过程,在中国高等教育中颇具代表性。自20世纪初开始,许多教会学校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⑦ 最初,社会学与社会科学不分。一个科系的规模和实力,与今天人们所理解的大不相同,可能只有一名教师,开设两三门概论性质的课程。多数教师是美国年轻的学士或硕士毕业生,到中国来主要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他们所受的专业训练有限,所开设的课程、使用的教材、组织的活动,往往取决于教师本人的教育背景和兴趣。教学内容有着浓厚的美国基督教社会改良的色彩,如“基督教社会学”、“社会改良”、“社会服务”、“社会工程”、“社会问题”或“社会病理学”等。多数教材是使用美国社会学界比较流行的书籍,如季廷史、狄利、罗斯(E. A. Ross)、爱尔伍德(C. A. Ellwood)、海逸史(E. C. Hayes)等人的著作。这些学校与美国的一些学校,如布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史密斯学院、威斯理学院等,建立了近似姊妹学校的关系。美国教师带领中国学生,在城市或乡村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会调查,写成论文乃至专著。这种集教学、研究、服务为一体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又一大特色。

① Hinkle, Roscoe C., *Founding Theory of American Sociology, 1881—1915*, Boston, London &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p. 45.

② Kulp, Daniel H., *Personal History*, 1933. BU.

③ Kulp, Daniel H., "Revised Suggestion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a Br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ology,"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Bulletin*, Vol. VI, No. 1, July 1919, pp. 26—28. UTS.

④ *Catalogue*, 1921—1922, p. 9; *Bulletin, Annual Report*, Vol. VII, No. 1, April, 1921, p. 2. UTS.

⑤ *Bulletin*, Vol. IX, No. 1, May 1924, pp. 41—42. UTS.

⑥ "Report of the Dean and Registrar," *Bulletin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Vol. XXIV, No. 1, July 1931, p. 17. UTS.

⑦ See catalogues or bulletins of Canton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 Ginling College, Boone University, 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 and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UTS.

第三节 “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①

大约与葛学溥在上海发展社会学同时,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约翰·步济时(John S. Burgess, 1883—1949),在北平推动社会服务工作,主持社会调查,并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国最有活力的社会学系之一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步济时出生于传教士家庭,1905年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毕业,去日本教了两年英文,之后到纽约协和神学院主攻教堂历史与宗教哲学,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学习。^②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修过社会学大师季廷史的课。季氏出生于牧师家庭,但在课堂上却激烈地批判传统教条思想,这给步济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在美国天普大学神学院教书时,对宗教保守派也做了同样的批判。步济时很早便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硕士论文,便是有关纽约华人的业余生活。^③

1909年,步济时受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Princeton-in-Peking)的委派来到中国,在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成立于1906年,是一个志愿组织,最初的目的是介绍普大的学生或校友到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工作。^④ 而基督教青年会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一般的教会不同的是,它着重为年轻人举办各种活动,并开展社区服务。例如,成立于1895年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修建体育馆、游泳池、操场,兴办职业高中、商业夜校,组织讲演会、音乐会,设立图书馆及阅览室,开展乒乓球、保龄球、棒球、排球等运动,这些在中国都是开创性的。^⑤

步济时到中国以后,最初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嫌恶那种外国人所过的被圈起来的孤立生活:西方人好似高高在上的君主,而中国人则是门卫、仆役、教师等,是西方人的走卒。北平房屋的泥墙,泥土街道,飞扬的尘土,气味和混乱,都

① 燕京大学校训,另一说法为“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源自《新约全书》。

② J. S. Burgess, "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d Burgess," PU.

③ *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1940*, pp. 223—224. PU.

④ J. S. Burgess, "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d Burgess," PU.

⑤ William W. Lockwood, *Chinese Y. M. C. A. Head Tells of 30 Years Work in Orient*, Reprinted from China Press Annual Review, January 1, 1934. UTS.

令他难以适应。他开始怀疑自己到中国来是否是个错误。然而,当他开始接触中国大学生的时候,他的疑虑一下子就打消了。他感到发现了一个从未开采过的金矿。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充满了理想,手中掌握着中国未来的命运。步济时认为,在中国的首都,没有任何传教士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帮助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领袖。在他看来,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接纳了西方的科学发明和机械装置,而这只不过是欧美文明的表面形式。他要让这些年轻人认识西方文化中伦理的与精神的核心动力——基督教。^①

于是,步济时在参与各种慈善事业的同时,尽量广泛地接触青年学生,特别是公立学校的学生。为了有效地传布基督教,他运用社会学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中国学生所感兴趣的书籍,以便掌握他们的思想。结果发现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特别受欢迎,包括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穆勒的《论自由》、詹克斯的《社会通论》、吉德的《社会进化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特别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与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最能抓住学生的心。^②自1911年起,每年或每隔一年的夏天,步济时便组织对基督教有兴趣的公立大学的学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开会,讨论的题目则结合基督教与社会服务,如“近代社会学与社会进步”、“耶稣的社会福音”、“慈善事业与社会工作”等。^③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的潘光旦,当时是清华学校的学生,便参加过这类活动。

后来,学生们逐渐不满足于一般的讨论,他们要为民众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传统中国士大夫高高在上,不屑于同下层人民为伍,而在共和体制下,学生们感到,他们必须领导人民,并服务于大众。步济时建议,为了服务人民,就先要了解他们。1914—1915年,步济时指导他们做了北平人力车夫调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详见本章第四节)。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众的疾苦,为他们提供服务,从而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学生们还进一步组织成立了北平社会实进会,吸收大、中学学生为会员,约有七百多人。他们为学校中的役工开办夜校,给孩子们修建操场,举办有关健康与公民常识的演讲活动。步济时的家经常成为实进会干事们的开会场所。^④

北平社会实进会所做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创办《新社会》旬刊。这是现代中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研究的期刊,也是“五四”时期一份极有影响的刊物。不

① *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pp. 2, 249, 259.

② Burgess, "What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Reading," *Some Tools for the Student Work*, Shanghai: General Committee, Y. M. C. A. of China and Korea, 1912, pp. 52-54. UTS.

③ Burgess, John Stewart, ed., *Some Tools for the Student Work*, Shanghai: General Committee, Y. M. C. A. of China & Korea, 1912, pp. 1-7. UTS.

④ *Autobiography of J. B. Burgess*, pp. 275-277. 但另有一说,北平社会实进会成立于1912年,见 Shirley S.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 M. C. A., 1895-192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33.

过,自1919年11月1日创刊,到1920年5月25日被警察局查封,它仅存在了六个多月。《新社会》主要由郑振铎、瞿世英、耿匡等编写,瞿秋白、许地山等也参与撰稿。据《发刊词》称,其宗旨是要改造社会,目的是实现德莫克拉西(民主)。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改造大多数中下层平民的生活、思想和习俗;是渐进的——普及教育并推动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是慎重的——实地调查社会的真实情形。

由此可见,《新社会》所遵循的是一种以社会调查来研究社会问题,以社会服务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该刊的内容包括报道社会实进会的活动,介绍西方社会学家及其学说,并论述社会研究方法。季廷史著名的“同类意识”的概念,在这里被用来说明社会服务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意思是说,由于社会不公、贫富差别悬殊,导致许多人生活困苦,因此,大家都会感受到痛苦。这需要“我们知识阶级里的人,利用职务的余暇,实地的投身于劳动阶级或没有觉悟的群众中,用种种切实的方法,以唤起他们的觉悟,改善他们的生活,增进他们的幸福”。^①《新社会》还探讨离婚、自杀等社会现象,并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描述劳工、贫穷、妇女等问题,如郑振铎《北京的女佣》和瞿世英《调查贫民收养所的报告》。《新社会》也介绍国外的社会改良思想和运动,如美国的新村运动及翻译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莫斯科调查问题》(1882,译为《社会调查问题》)和《我们要怎么办呢?》(1884)。社会服务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改造。面对黑暗、压制、残酷的现实,《新社会》极力鼓吹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的成功,需要全社会人民的觉悟。因为中国识字的人不多,所以要学俄国青年“去与农民为伍”,实地去做改造的工作,分散到各省各乡镇,从小区域做起,应立刻去做。^②

社会实进会成立初期,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以后逐渐淡化。主办《新社会》的骨干成员,尽管后来并未成为职业社会学者,但却有许多人成为社会活动家。他们或献身于平民教育,或参加共产党,其远大目标即解救下层民众的苦难,实现社会改造,这种信念始终未变。

步济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带领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几年之后,他开始考虑同大学合作,建立一个培训社会服务人员的正规机构,以便此项工作能持续而有效地进行。在他看来,社会服务工作作为基督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社会服务的目的同基督教的出发点一致,都是要解放人,使他们从局限的环境中

① 郑振铎:《社会服务》,载《新社会》,第7号,2页,1920年1月1日。

② 参见郑振铎:《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载《新社会》,第3号,1页,1919年11月21日。

获得发展机会,从而有一个健全的人生。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便需要培养“社会工程师”和“技术员”来设计社会发展,解决比比皆是的社会问题:穷困无知、劳工悲惨的处境,城市中的娼妓、鸦片、犯罪等。^①于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合作对象——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是由四所教会学校,即北京汇文大学,北通州协和大学,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及神学院,在1915—1920年间先后合并而成。^②作为一所私立教会学校,其运作经费主要靠美国的个人或机构的捐助来维持。1919年,在中国出生、通晓中西文化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担任校长。1929年后他改任校务长,直到1946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止,他始终主持校务工作。在燕京大学那坐落于北京西郊景色优美的校园里,每一个楼阁都有英文名字,以纪念捐款建筑者。校园中的建筑模仿中国传统宫殿的风格,而内部的设备和布置则同当年美国一般大学相似。燕京大学最初在美国立案,后又在中国教育部立案。因此,毕业生领双份文凭,一份是中国教育部发的中文证书,另一份是美国纽约州发的英文证书。^③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界,燕京大学是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精华的学术重镇。

自1918年开始,步济时同时在燕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和神学院任教。^④在他的主持下,由北平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社会学系。实际上,有几年的时间,燕京大学有两个社会学系:一个是文理学院的社会学系,有时也称为“社会科学系”;^⑤另一个是神学院里的“基督教道德与社会学系”。^⑥步济时认定,“燕京大学是培养领导骨干的机构”^⑦,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力。他为社会学系所制定的方针,同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一致,是教学、科研、服务三者并举。社会学系建立之初,开设了两门课

① John S. Burgess, *The Training of Social Workers in China*. Shanghai: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LV, No. 7. July 1924, pp. 426-427. UTS.

② 要了解燕京大学的历史,详见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③ 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燕大三年》,2、4、7页,1948.

④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 and School of Theology, 1920-1921,”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No. 3, p. 4. YDS.

⑤ *President Stuart's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Peking University*, June 11, 1920. p. 5. YDS.

⑥ “Announcement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Women,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for Men, and School of Theology, 1920-1921,” *Peking University Bulletin* No. 3. pp. 56-57, 80-81; “Report of the Dean of the School of Theology,” *Annual Reports of the President and Deans to the Board of Managers*, June 1923. pp. 49, 53. YDS.

⑦ Burgess, “Where East Meets West,” *The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Vol. xxviii, No. 12, December 16, 1927, pp. 338-340. PU.

程:一是“社区组织”,由步济时讲授;二是“社会调查”,由甘博(Sidney D. Gamble)与步济时共同讲授。^①甘博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校友,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在教授“社会调查”一课的过程中,甘博带着学生们,对北京市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有瞿世英、谢婉莹(冰心)等。调查结果汇编成《北京社会调查》一书出版(详见本章第四节)。^②

社会学系在创办之初,教员都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在燕大的工作属义务性质。^③后来,由于获得了外界的捐款资助,步济时能够逐渐聘用一些中国教员,开课范围也不断扩大。到20世纪20年代末他返回美国时,社会学系的课程已扩充为理论社会学与人类学、应用社会学、社会研究、社会工作及实习等5组。学生可分别获得理论社会学学士学位、应用社会学学士学位、社会服务工作证书或社会服务工作学士学位及证书。全系有9位全职教员和9位兼职教员。社会学系开设的课程有40多门。^④在全校403名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中,社会学系有51人,是较大的系之一。^⑤社会学系还出版了学术刊物《社会学界》;开办了清河实验区(详见后面相关章节);成立了燕大学生社会服务团,团员为燕大各系学生,依靠少量私人捐款,开办平民学校、豆奶厂,并进行监狱布道、调查等活动。^⑥此时,燕大社会学系已经发展得颇具规模。

一般说来,要办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充足的经费。燕大社会学系主要依靠两个基金会的支持:一是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下简称洛氏基金会)。从1928年开始,罗拉·斯贝尔曼·洛克菲勒基金^⑦每年提供2万美元,持续7年共计14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加强燕大的社会科学的的教学、研究、服务等。^⑧此后,洛氏基金会长期资助燕大社会学系的多种学术及社会服务活动,并提供奖学金给燕大教师(如张鸿钧、严景耀及步济时等)赴美深造。二是燕普社(Princeton-Yenching Foundation)。1930年,由于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反宗

① J. S. Burgess, *Some Recollections of Princeton's Work in China*, p. 6. PU.

② 中文报告有北京的教育、救贫事业与慈善机关、工商业、监狱、人口、医院及公共卫生、娱乐、宗教等,共7篇。见谢婉莹、瞿世英辑:《北京社会的调查》,载《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1920年9月。

③ J. Stewart Burgess, *Some Recollections of Princeton's Work in China*, ca1940s, p. 6. PU.

④ Yenching University, “Announcement of Courses in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 *Bulletin* 1929-1930. UTS.

⑤ *Letter from Burgess to the Trustees and Friends of Princeton-in-Peking*, November 10, 1928. PU.

⑥ *A View of the Work of the Social Service Club of Peking University* (燕大学生社会服务团一览), Peking: Tung Cheng Printing House, 1924-1925. PU.

⑦ 这是为纪念洛克菲勒夫人建立的基金,成立于1918年,1929年转入洛氏基金会的社会科学部。从1923年至1928年,共有两千万美元的资助用于支持社会科学研究,详见 Martin Bulmer, “Support for Sociology in the 1920s: The 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Large-Scale,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Universit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Vol. 17, November 1982, pp. 185-192.

⑧ *Letter from Beardsley Ruml to Mr. Leighton Stuart*, June 6, 1928. YDS.

教、收回主权运动,普林斯顿大学驻华同学会改变其工作重点,成立燕普社。该组织的任务是在美募捐,以资助燕大的三个社会科学系,即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系,以及后来增添的经济学系和政治学系。这三个系组成一所学院。由于燕京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密切联系,该学院参照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关系与国际事务学院,取名为“公共事务学院”,后曾一度改称“应用社会科学院”,中文名称为法学院。20世纪20年代末,燕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约403人,法学院的学生则占全校学生总数的44%。^①步济时于1929年返美,为燕普社募款,并就中国问题发表演说。^②此外,燕大社会学系的教师甘博,回美国后担任燕普社主任多年。他出身富有,不但凭借自己的身份努力为燕普社募捐,他本人也多次为燕大捐款。燕大社会学系的第一位中国教师许仕廉,便是甘博个人出资聘任的。^③

由此可见,社会学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发展的初期,同美国传教士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毋庸讳言,这些人的初衷是从基督教出发,企图在中国传播宗教和西方价值观,带有强加于人的意味。但同时,也不应否认他们当中确有一些思想开明、富于理想与献身精神的人士,步济时就是其中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面对中国发起的反基督教运动,他所阐述的观点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在1.2万多美国驻华人口中,教会及其所办的医院、学校、青年会等慈善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占了三分之一。步济时认为,要评估教会工作的价值,一定要看教会对于建设新中国有什么永久性的贡献,并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

步济时还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个词代表了外国人强加给中国人的政策。从外国租界到教会大学里的教堂,都象征着外国人的优越感,对中国人民的能力、志气、文化传统缺乏欣赏,以及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屈辱。中国人民期望建立一个统一的、自尊的国家。然而,中国近代历史却证明:除非迫不得已,外国人不会自动放弃特权。长期以来,尽管租界里的卫生、道路、治安是最好的,但是这里居民的态度与行为却令人反感。许多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他们唯一接触的中国人是仆人与买办。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反对任何减少外国商人特权的做法,这些特权包括从廉价劳工和免税中获取巨额利润。某些教会与传教士们对待中国教徒的态度是家长式的,这种做法也增加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反感。教会与教

① Letter from Burgess to the Trustees and Friends of Princeton-in-Peking, November 10, 1928. PU.

② Burgess, Statement Regarding Academic Training and Experience of John Stewart Burgess, pp. 3-4. PU.

③ 见 Princeton Peking Gazette. I. 1, February 1925, p. 7. PU; Various correspondances of S. D. Gamble. YDS.

会学校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是国耻。反基督教运动其实并不那么反对基督教本身,而是反对它所代表的外国势力以及传教士们所来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

步济时相信,中国最终会完成国家统一,并实现主权独立。美国最终必须调整其与东方国家的关系,使之建立在互利与公平的基础上。从长远来看,美中之间的经济往来,不能靠最惠国待遇维系,而是要建立在贸易无国界的原则之上。美国人应该重新思考种族问题,并改变种族优越感。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要学习西方。但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会采取生吞活剥的方式,而是将选择吸收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也将对世界文化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①

应当说,步济时能够深入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并能比较客观地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像他这样有学术兴趣、服务热忱、思想开放的传教士,不但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建立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也被誉为中国“社会工作之父”),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②

第四节 以实地调查记录社会变迁

社会学要脱离思辨性的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其最基础的工作,莫过于社会调查。因此,除在教会大学中建立社会学系外,美国传教士们的另一项工作重点放在了社会调查上。

社会调查在不同时期曾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学发展初期,社会调查指的是运用统计方法,系统、客观地记录和分析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在这种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兴起之前,曾出现过许多描述社会状况的作品。例如,中国的地方志有记载各地风俗礼仪的传统。早期在华传教士也做过一些工作。如早在1865年,美国传教士杜立托便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国人的社

① 以上3段,见J. Stewart & Stella F. Burgess, "The American Stake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Survey Graphic, May 1927, for Princeton-in-Peking. PU.

② 步济时去世多年之后,1973年,中美关系开始“解冻”。步济时夫妇在北平时代的一位老友要去中国访问。步济时夫人请这位朋友把一个带有和平标志坠子的银项链带到中国,送给一位中国杰出的女诗人(步济时夫人本人是诗人)。于是这个在瑞典制造、在巴塞罗纳的联合国商店里购买、象征着和平的项链,又回到了中国——那片他们爱之如此深厚的土地。见 Obituary of S. F. Burgess. PU.